

清

● 凤凰县党史办编

清出山泉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清清出山泉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(滇) 新登字01号

责任编辑 唐 弼

封面设计 俞新宇

清清出山泉

凤凰县党史办公室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625 字数: 183000

1993年7月第1版

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-222-01275-3/I·307 定价: 3.25元

目 录

- 共产党人的情怀.....姬 子 (1)
- 石桥“王冠” 随行录徐德君 (32)
- 工厂之子滕和叶 (59)
- 清清出山泉子 叶 (87)
- 大江东去刘 阳 (106)
- 路.....江国娥 (120)
- 老 灯.....滕和叶 (134)
- 情梦屋宇徐 荣 (151)
- 真 情.....熊 幽 (165)
- 潇洒工商场付元状 (175)
- 开发潮.....李 春 (184)
- 致富之路鲁 岚 (200)
- 这里是“娘家”熊 幽 (219)
- 雨中公路小调.....叶 子 (231)
- 情在深山刘 阳 (260)

共产党人的情怀

姬子

1990年12月2日中央广播电视台的“新闻联播”节目，播放了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全国优秀纪检干部的消息，当镜头转到一个毕恭毕敬的被接见者的身上时。人们哗然了。

这个被接见者叫喻理华他只是一个县的纪检委书记，却连续三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真是够幸运的了。

“初生牛犊不怕死”

喻理华是湖南宁乡县人，1950年毕业于湖南“革大”。在当年分配到凤凰县的四十多个干部中，数他最小还不满18岁。那时，他着一身肥大的灰平布衣服，衣长过膝。他挂着盒子枪，走起路来一打一打的，俨然是一个“小八路”。

自清代中叶以来，凤凰都是湘西的重镇，封建势力相当强大。解放初有很多土匪尚未消灭，群众也还没有发动起来，生活很困难，工作环境十分艰苦。

喻理华分配到凤凰，正值暮春三月。他一下子就被这里的一弯绿水、四围青山，万紫千红的美丽风光吸引住了。一

天下午，他独自一人爬上马颈坳，登上南华山，饱览山城景色。傍晚，日头落下了西边的山顶，天边余留的云彩，镶上了金色、玛瑙色和淡紫等缤纷色彩，如象苗家姑娘的衣衫精致而华丽。石头城中，墨黑的屋脊上灶烟袅袅，给人遐思。喻理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家乡：宁乡虽近长沙，接湘潭，西拥大浏，北依雪峰，山川形胜，但也远远不如凤凰的山水令人留恋忘返。直到山城被夜幕包裹，喻理华这才返回了住地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喻理华刚进门，政委崔强便找上门问道。

“到山上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看看地形，熟悉情况。”

“谁批准的？”

“……”喻理华答不上了。

“毫无组织纪律！”崔政委脸色一变：“你不是小孩，是革命干部。你擅离队伍，万一老虎把你吃了，土匪把你捉走，怎么办？这个责任谁担当得起？你给我好好检讨。”

崔强不是吓唬喻理华。不过两个月，以龙恩普为首反共救国军，狂言有雄兵三千、猛将百员，占领了总兵营，攻打阿拉营、得胜营，并扬言要围攻凤凰县城。

过了几天，凤凰县人民政府成立。喻理华被分配去县委会把守电话总机。喻理华虽不乐意，但因为刚受了批评，也不敢申言，只得接受下来。

一天，县常备队指挥部摇来了一个电话说：

“喂，谭指挥指示，要你们崔政委、宋县长来谭指挥公馆商议事情。”

“什么谭指挥？”喻理华不解地问。

“你不知道？！”对方盛气凌人地回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谭自平，陆军少将，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兼军事组组长，常备队指挥官。你怎么也不打听、打听”。

“哎呀！这么吓人的官衔！”喻理华由讽刺转而强硬地说：“这些，我一概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只有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崔强，县长宋子兴。要商量事情，你们谭指挥何不到天主堂来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对方质问。

“我姓喻，名理华。怎么样？”

半小时以后，谭自平带着八名挎手枪的随从，雄赳赳地来到了县委会。谭自平同崔、宋二人打了招呼以后，说：“你们一个守电话的同志口出狂言，如不严加教育，势必有伤和气，于事不利。”

晚上，崔强把喻理华叫到自己的寝室，问清情况以后，批评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做里傲气的？这是什么时候？！”

“他们的态度使我受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说什么谭指挥指示。”喻理华很不服气地说：“为什么一个县国民党的常备队指挥，要指挥共产党的县委书记、县长呢？这一点我不服。”

“现在的问题是——”崔强在煤油灯前站起来说：“我们要从大局出发，要从凤凰十多万人民的利益出发，要从党的工作出发，小不忍，则乱大谋。按照你这种认识，就会把事情搞乱，大几百常备队，还有几千土匪，如果稍欠谨慎，处理不当，就会一起对着我们。我们只有警一警二两个连，那

时你看怎么办？”崔强稍微停了一下说：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死。”

坚持实事求是需要权力与胆略

过了二十年以后。喻理死年到“不惑”，血气方刚。

1970年，喻理华从县委农工部长被调到苗族聚居的落潮井公社担任书记；1972年又调来县革命委员会任生产指挥组第三副组长，负责指挥农村生产工作。那时，形而上学猖獗，四害横行，毫无实事求是可言。

春节过后，喻理华同县革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去州革委会开会，接受一年的生产任务。这年，州革委是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要大搞双季稻的，以实现粮食跨《纲要》。

会议一开始，州革委办公室的同志就发来了一张表，项目有：稻田面积，计划种双季稻面积，实际可插双季稻面积，等等。那位县革委领导要喻理华填。

“双季稻计划种多少亩？”喻问。

“十万亩。”

“这恐怕不行！”喻理华竟然提出了质疑。

“为什么？”这位领导很反感。

喻理华边算帐边说：“我们县总共有稻田面积是二十八万多亩，而水利过关旱涝保收的只有十万亩，这十万亩中阴山峡垅的冷浸田有四万多亩；种油麦的有三万亩，还有三万亩，处于高寒地带，日照短，躲不过寒露风，恐有种无收。我看最好是先搞一两万亩试试。”

“那不行！”这位领导接过表来说：“你的观点有问题，是形而上学的；只见物不见人。人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恩

想这个伟大革命真理，就会改变一切的。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。你只看到二十八万亩田和气候等自然条件，而看不到二十四万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各族人民。他们可以战天斗地，人定可以胜天！用这个观点来看，我们插十万亩双季稻是完全可以的。”

“我认为在科学技术没有高度发展，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以前，我县要想插下十万亩双季稻，而且保证高产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喻理华很耐心地算了一番水利、季节、劳力、肥料帐以后又说：“我们种三万亩都是最大胆的尝试，最勇敢的牺牲，再多根本无法办到。如果插上五万亩，产量就要减一半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目前上级已经明确提出，种不种，种多少双季稻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双季稻就是方向稻、革命稻。”

“我认为这种提法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按其固有的规律办事，实事求是。如果我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，有些把幻想看成现实，把在将来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，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办，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，在思想上是唯意志论；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。”喻理华稍顿了一下继续说：“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，也就是修正主义。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，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。我们要种十万亩双季稻正是这种表现。”

“我不再与你狡辩！”这位领导抽出钢笔填了十万亩说：“我填我负责，这个赌注我下。”

他们回到县上以后，集中领导，集中劳力，集中物力，一

直把播插十万亩双季稻的任务当成头等重大政治任务来抓。岂知，这年天公也不作美，寒潮、低温，春旱连夏旱，尽管使尽了强迫命令的手段，到立夏后三天，全县只播双季稻种三万亩。那位县革委领导，好象打了败仗似的汗流满面，从“前线”跑回生产指挥组，他一眼就看到一群干部正在热烈地讨论什么，便问：“你们在学什么？”

“学习全国计划会议上的一份简报，据说是周总理批准的——《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》。”喻理华说。

“下面工作这样紧张，你们还学什么文件。”

“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是应该学习的。”另一个干部插话。

“不要你讲！”这位领导发火了。他转头，没好气地问喻理华：“双季稻插下多少了？”

“四万七千亩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这位领导故作惊讶地说：“你不是说最多只能插三万亩吗？怎么又插了四万七千亩呢？”他显然是在嘲讽喻理华保守。保守就是修正主义。

“这里面有许多虚夸的数字。”

喻理华打开本子，谈了一些下面的会报，说：“实插也超不过三万，我看季节已经到了。”

“我问你！”这位领导反感地说：“为什么又连五万亩都插不上呢？”

“还有两万多亩油菜、麦子、草子种田不能插。”

“什么？油菜、麦子、草子种田不能插早稻？”

“是不能。”喻理华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今天已经是五月

十二号了，已是立夏的第九天，都快到小满了，还能用油菜、麦子、草子种田来插双季早稻吗？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这位领导在桌子上一拍，气虎虎地说：“我说能！”

“不行！”喻理华也站立起来说：“我说不能！”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几个干部忙异口同声地解劝说：“有话好好说，别吵。”

喻理华说：“中央有指示，能够做到的事情，应该努力做到，实在做不到的事情，不要硬说做得到，一切领导机关，切不可对下面提这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。对那些爱说假话和逼别人说假话的人，要放手批评低制，不能把反对说假话，顶歪风看成是‘泼冷水’，不搞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。”

“你别来那一套！”这位领导十分气愤，不得不亮出了“王牌”：“到底是我领导你，还是你领导我？到底你服从我，还是我服从你？！”

“我还要讲”。喻理华说：“改革农业耕作制度，推广技术措施，这要靠科学技术，而不能靠强迫命令、瞎指挥，一刀切；应当和群众商量，一切经过试验，实事求是，逐步推广。这是中央的指示。到底中央领导县革委，还是县革委领导中央？是中央服从县革委，还是县革委服从中央？”

“离心离德！”这位领导气冲冲走出了生产指组办公室。末了还狠狠地甩下一句话：“保守办公室！”

1972年，凤凰县遇到了特大干旱，加上特大的乱指挥，55000亩旱涝保收的稻田硬要用来插双季稻。因水利条件未过关，只有15000亩能插晚稻。早稻亩产也只有130斤。实际

是4万亩好稻田亩产只有170公斤；最少的每亩比中稻的亩产还少240斤。15000亩稻田每亩产量只达476斤。脑子田全部减产，因搞双季稻肥料、劳力和资金大部花光；使其他的田更加减产。这年，全县粮食总产只有8200万斤，比解放前夕1949年还要减少1400多万斤，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。但是，围绕如何上报产量问题，还引起了一场争斗。喻理华是凤凰县的“农业通”，县革委主要领导虽然对他有气，但又不得不与他商量。一天，开完公社书记会议以后，在县革委招待所的客房，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

“老喻，上级催报产量，你看报多少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喻理华说。

“我看报1亿4千万斤吧。”

“多了”。喻理华说。

“那就报1亿3千万吧。”

“还是多了。”喻理华仍不同意。

“那报多少？”

“实是求是，是8400万斤。”喻理华主张。

“那我们不是白干一年，还有什么成绩可言？这不仅丢我们的脸，也丢州委的脸；不仅说我们无能，上面可能要追查责任。到时候我们都是不好承受的。”

“现在的问题——”喻理华沉重地说：“现在的问题不是好不好承受的问题，而是群众要吃饭的问题，是24万多人过不过得去的问题！如果照你说的报了，不好受的不是我们，而是10几万、20多万人民群众。我们要对人民负责，而不是对自己的面子负责。”

老喻扳着手指给这位领导算帐：征购任务要去3047万

斤；种子、饲料2500多万斤，两项合计数为5547万斤。我们全县产粮8400多万斤，减去5547万斤，只有2900多万斤，每人平均口粮只有100多斤原粮。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：春节以后，全县24万人，最少有一半人要断粮！这样多的人断粮、饿饭，那该是什么样的情景？这个责任你我都担当不起！”

那位县革委领导用三个指头叉着脑门，感到十分头疼；喻理华用左手托着下腭，用钢笔在十行纸上划来划去，仔细校对自己的粮食帐是否算得精确。也感到十分脑火。他把钢笔一放，眼睛一闭，说：

“我要如实地上报。”喻斩钉截铁，“我报我负责！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向人民负责，要讲真话。讲了假话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。”

“那由你吧！”那位领导点上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猛烈地吐出烟雾，睥睨着喻理华。

这年，州委根据喻理华报的产量数据，经过几次检查复核以后，减去了凤凰的征购任务3047万斤，发放统销粮稻谷4650万斤，发放救济款580多万元。凤凰县24万多人民，这年勤俭节约，渡过了比1960年更为严重的灾荒。社会稳定，生产正常。但是，这年凤凰一降而成为全省十个贫困县的第二名。接着，喻理华也就因为“革命需要”，被派为某工作组组长，长期在生产队“蹲点”。当领导与他谈话时，他说：“只要允许我搞生产，我就绝对服从。”为此他曾写了两则日记：

“只要全县人民有饭吃。生活稳定，这就拯救了我的灵魂。”

“坚持实事求是，需要权力和胆略。”

“我们不怕违抗‘天神’的旨意，
努力干我们的”

从县城向西约八里路，有个地方叫胡家坳，解放前是土匪杀人越货的地方，现在却是满山满坳翠绿欲滴的桔子树林。每年十月金黄桔子挂枝山，一年要收30多万斤桔子。凡是知道这花果山来历的人，真不想起喻理华。

1957年冬，喻理华任城郊区委书记，他与城郊公社书记田茂裔、园艺技术干部杨炎美商议，要把在土桥垅那片荒山开垦出来，搞成一大片桔子园，只要每亩产桔2000斤，按每公斤0.4元计算，一亩也可收上500多元，100亩一年可以收5万元。这样，公社也再不是“清水衙门”了。公社有了点资金，就可以用来发展社队企业，发展一点商品生产，把农村经济搞活。如果这条路子走通了，那么城郊公社以致城郊区，还有全县其他很多地方发展经济也就有办法了。农民出身而当了公社书记的田茂裔，非常赞同喻理华的这个办法，随即组织劳力突击几天，终于搞出了个高标准的桔子山。全山约有30多亩荒地，并连一片有几株纵树（马尾松），松树的山也全开垦过来。

一天，上面有几位大“官”驱车从胡家坳经过，看见深冬严寒天气还有成群的社员在山上烧起火堆。他们不知何故，问：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搞花果山。”

“什么花果山，明明是毁林开荒。山区开荒，湖区遭殃！这在山区是不恰当的，是乱指挥。”一个随员指责说。

“哼！”一位肥头大耳的大“官”把头一抬，懒洋洋地说：“什么花果山，我看既无花又无果，是劳民伤财。”又一位大“官”，慢地把头从小车窗里伸出来，命令说：“叫他们头头来！”喻理华、田茂裔穿着草鞋急走过来，以为这一下子说不定还会有点投资什么的，因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首长有什么指示？”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是区委书记。”田茂裔指着喻理华介绍说：“我是城郊公社书记。”

“我命令你们，马上把这些群众叫回去！”喻理华正欲解释，那位大领导又厉声地说：“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？搞什么花果山，既无花又无果，明明是整群众，是劳民伤财！你们不停止挖山，我就撤你们的职，就要发动群众批判斗争你们！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”喻理华正准备开口把他们顶回去。嗵！三部小车已下了胡家沟，直向县城飞奔而去。

无头无脑被挨了一顿批评，田茂裔一肚子委曲地对喻理华说：“他们省里、州里的下来检查工作，又不了解情况，胡乱批评，这才是官僚主义乱指挥呢！既要我们领导生产，难道我们连一点自主的权力都没有？”

喻理华说：“领导生产没有自主权，这就是我们落后的根源。要搞好生产必须放权。……毛主席批评一些官僚主义者下车伊始，现在他们连车也不下，而是坐在车上就伊始。指手划脚，随便骂人，这种作风才是国民党作风，十个有九个要把

事情弄糟。我们别管那一套，还得来一个反其道而行，不仅要搞，还要扩大。原计划搞50亩，以我看就搞它120亩。再过几年，等花香果甜了，我们再让他们来看看，看他们羞愧不羞愧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，谁是谁非，让实践来检验。”

“他们当面骂你们，你们手腕拗不过大腿。你们就不可以在背后骂他们？”一个社员在一旁看得十分呕气。

喻理华说：“不要呕气，也不要骂。我们不怕违抗‘天神’的旨意，努力干我们的！”

就这样，当年他们真栽了桔子树120多亩。过了几年，收获桔子30多万斤，收入10多万元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他们又进一步大力发展，到1988年已栽桔树190多亩，收入也在逐年增加。现在每当谈起胡家坳的花果山时，人们都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有些当官的，喜欢到一个地方，就指手划脚，这也不对，那也错误。这实在是最可恶的，一定要弄坏事情，一定要失掉群众。如果当时我们按大官儿们的意见办事，哪能还会有如今这样一大块桔子园，哪能有这样多的桔子上市？所以我们办事，只要是对大多数人民有利，我们就要坚决地办下去，办成功。不要唯上，而要唯实唯民。”

近20年，喻理华在任城郊区委书记、县农委副主任、县委宣传部长、县纪委书记期间，认真地总结了胡家坳花果山的办园经验，接着与高级农艺师杨炎美一道在廖家桥公社的天星村、葛蒲塘村、八斗丘村，以致整个县城郊区和其他许多可以种桔树的地方，发动大家栽桔树，办小型花果山，走南华公社发展经济之路。已初步形成了万亩桔林。涌现了一大批柑桔园中的“万元户”。

1991年初冬，喻理华在城郊各乡发动村民栽果木。水打田乡五林村一个姓刘的村民请他到家里参观桔园，很高兴地对喻理华说：“喻书记，你给我们谋划的发财办法，指引我们致富的道路是正确的。我家每人平均不到5分田，一直想富不能富。1986年你到这里发动我们种桔，我搞了一块大桔园，1989年开始受益，1990年收入12000元，一家6口人均收入2000元；1991年收入达到3万元，人均收入5千元。只要路子对，越走越宽广，万元、几万元，实现小康生活是没有多大困难的。喻书记，你是个好书记，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山区人民打主意。现在我们很多人脱贫致富奔小康都难为了你！共产党不兴修庙纪念个人，要兴的话，我们要修一个喻公庙来纪念你。”

“别纪念我，纪念共产党吧！”喻理华说。

“共产党员应该为人民办点实事”

喻理华搞农村工作有个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：就是偏爱走那些人迹罕至、偏僻贫困的村寨。了解那里的情况，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。往往是爬山涉水步行几十里，把那里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，地名、人名……记得烂熟，然后再到乡政府、区公所和县直属有关部门去谈情况。有的事，下边单位的同志往往是一问三不知，或者谈的牛头不对马嘴，或者若明若暗、似是而非。这时，喻理华则有名有姓、一五一十、有观点有事实、生动具体地把情况和工作意见告诉他们。接着才提出：我们的注意力不光是放在条件好、生活好、交通方便的地方，更重要的要注意那些贫困落后的村寨，因为那里也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